

2000—2020年山西省人口迁移及影响因素时空演变

王佳龙, 孟万忠, 李易诚

(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利用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观察分析山西省及地级市在2000—2020年的人口时空分布变化。以山西统计年鉴数据资料为基准, 探讨人口迁移与影响因素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 山西省人口总量变化不大, 城市人口数量仅太原市、晋中市保持连续正向增长, 太原市人口发展迅速; 太原市迁入人口构成以本省其他县区人口为主, 各地级市对于本市区人口有较强吸引力; 人口迁移驱动因子与地区经济水平、教育资源、交通建设、住宅价格和人均收入有关; 通过对空间格局、产业结构、教育分配、交通设施与落户门槛五方面综合规划, 可有效提升山西省城市综合实力和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研究结论有助于山西省各地级市合理展望和计划未来人口流动分布格局, 促进山西省内各地级市人口迁移良好互动, 为人口管理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关键词: 山西省; 2000—2020年; 人口迁移; 时空演变;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14-0010-06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1]。国内对于人口迁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 理论体系也较为陈旧。对于人口迁移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的趋势^[2]、空间模式^[3]、影响因素^[4]、数量属性^[5]等方面。蔡霞^[6]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就业结构等进行了分析; 刘静玉等^[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城乡收入差距与就业机会差别驱动人口产生迁移行为, 交通成本则对人口迁移产生负向影响; 刘静玉等^[8]发现流动人口多迁往省会城市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国外对于人口迁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早, 理论体系也趋于成熟和完善。研究领域集中在人口迁移的迁移规律^[9]、群体特征^[10]、驱动因素^[11]、政策研究^[12]等方面。1885年英国拉文斯坦率先提出推拉理论, 对人口迁移成因做出具体分析并提出人口迁移七大定律^[13]。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揭示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14]。1991年Stark提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认

为家庭作为决策主体, 在预期收入水平和承担风险水平的衡量下做出迁移行为^[15]。

目前国内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省级尺度, 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大尺度区域, 对于中微观尺度地市级研究还相对匮乏^[13]。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国家为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和形式需要, 在2020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目的是统筹规划城市规模, 合理确定人口结构与人口密度^[17]。为此需深入研究历史时期内山西省迁入人口的分布特征, 探析其影响因素并做出相应对策, 这对于科学评估人口布局,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18]。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是我国典型资源型省份, 地处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过渡地带, 总域面积为15.67万km², 省内地势以山地、丘陵为主, 汾河是其本土最大河流,

收稿日期: 2024-03-1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1142); 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2022YJJG244);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20220938); 太原师范学院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SYYJSYC-2332)

作者简介: 王佳龙(1998—), 男, 山西长治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环境变迁; 通信作者孟万忠(1971—), 男, 山西太原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地理科学、环境变迁; 李易诚(1998—), 男, 安徽蚌埠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环境变迁。

并与太行山、吕梁山形成“两山夹一川”地貌,构成山西省整体地貌格局。截至2023年末,山西省常住人口为3 465.99万人,行政区划下辖11个地级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 698.18亿元,省会位于太原市。

1.2 数据来源

山西省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迁入人口数据取自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经济、教育、公路通车里程数据等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2021》。人均可支配收入取自山西省统计局官方数据、住房均价利用安居客应用软件查询所得。

2 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分布

2.1 人口数量变化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山西省人口为3 248万人,2020年山西省人口为3 490.5万人,人口总数变化不大,但是省内各地级市人口变化显著,所以本文着重于省内各地级市迁移路线,对于山西省人口变化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依据表1可以明显看出山西省各地级市在2000—2010年常住人口数量都发生了持续增长,在2010年之后(太原、晋中除外)逐年下降,太原、晋中仍保持正向增长,太原人口发展迅速,且与其他地级市差距逐渐扩大。与之对应人口所占比例太原在2020年达到15.24%,较2000年增长将近5个百分点,城市首位度愈发领先,在本省优势持续扩大。人口密度方面山西省各地级市差距不大,人口密度除了太原普遍较低,太原2020年人口密度达到761.16人/km²,而忻州最低人口密度为107.36人/km²,受太原省会城市辐射虹吸作用,忻州人口不断向太原发

生迁移,导致本地人口数量锐减。另外,由于晋中与太原毗邻且与太原经济往来关系密切,受太原的辐射影响,晋中人口也保持正向增长,常住人口数量轻微增加。

2.2 迁入人口构成

2000年山西省迁入人口总量达372万人,2010年山西省迁入人口676.47万人,2020年迁入人口1 289.12万人,20年间迁入人口总量增长了2.46倍,人口流动广度、深度不断加深。各地级市除了太原迁入人口构成主要来自本市县区内人口;太原较为特殊,辐射范围覆盖全省,对本省其他县市迁移人口有较强吸引力,到2020年来自本省其他县区迁入人口占比达到59.45%。外省迁入人口较少占比最低,其原因是山西整体水平在全国排名较为落后,山西本省对于外省人口的吸引辐射能力较弱。2000年山西省内跨县迁入人口为305.32万人,省内跨县迁入率高达82.06%,迁入人口主要来自本省县市。2010年省内跨县人口流入583.3万人,同期占比为86.23%,至2020年省内跨县流入人口达1 127.06万人,占山西省迁入人口总和的87.43%。本省跨县流动人口持续增加,且占比不断上升。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获得城镇户籍创造了条件和便利。如图1所示。

2.3 时间演变特征

山西省地级市人口总量在2000—2010年呈现增长趋势,迁入人口数量持续上涨,增速较为平缓,迁入人口主要是来自本市县区人口。到2010年太原、阳泉本省其他县区迁入人口超过本市县区迁入

表1 山西省地级市人口分布比例及密度变动

地级市	人口/万人			人口分布比例/%			人口密度/(人·km ⁻²)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太原	334.40	420.47	531.90	10.30	11.76	15.24	478.53	601.70	761.16
大同	300.30	332.09	310.10	9.25	9.29	8.88	211.80	234.30	218.80
阳泉	127.31	136.92	131.80	3.92	3.83	3.78	276.82	297.72	286.58
长治	313.90	333.70	318.00	9.66	9.34	9.11	224.94	239.12	227.87
晋城	216.20	228.00	219.40	6.66	6.38	6.29	227.82	240.25	231.19
朔州	145.20	171.60	159.10	4.47	4.80	4.56	136.98	161.89	150.10
晋中	301.70	325.20	338.00	9.29	9.10	9.68	183.96	198.29	206.10
运城	481.00	513.90	477.20	14.81	14.38	13.67	339.14	362.34	336.46
忻州	293.80	307.00	268.40	9.05	8.59	7.69	117.52	122.80	107.36
临汾	395.60	432.10	397.20	12.18	12.09	11.38	194.86	212.84	195.65
吕梁	338.40	373.00	339.50	10.42	10.44	9.73	161.14	177.62	161.67

注:数据来源于各年份山西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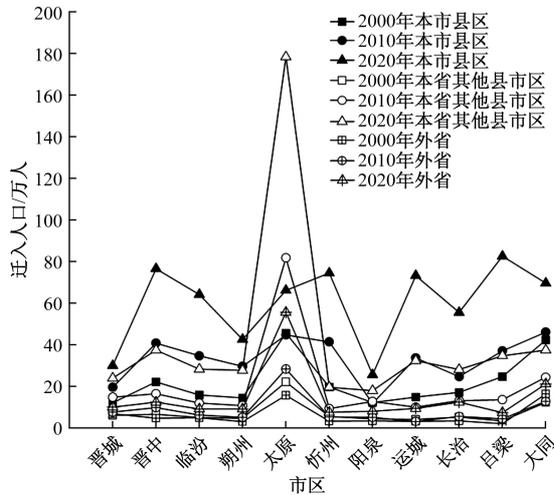


图1 2000—2020年山西省迁入人口构成变化

人口。2010年是人口总量变化“拐点”，2010—2020年人口总量变化中有9个地级市在2010年达到人口峰值，之后逐年人口回落。各地级市除了太原、晋中都出现人口下降。迁入人口增速发展，迁入人口来源除了太原主要是本市市区人口。太原辐射全省，吸引本省人口不断涌入，成为本省迁入人口聚集地。2000—2020年太原、晋中人口保持正向增长，太原人口增长迅速。在人口数量变化与占比当中，太原出现三连跳，人口占比逐年持续上升，变化最为明显，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有关。忻州、运城人口占比下降较为明显，在各地级市中人口占比下降最为强烈。忻州由于近年来太忻一体化，受太原的辐射虹吸作用，人口不断向太原迁移导致忻州本地人口数量锐减。运城城市由于与陕西省西安市距离较为接近，受西安的吸附作用运城城市本地人口陆续向西安市不断迁移。

2.4 空间演变特征

总的来看，山西省人口迁移聚集地围绕在太原—晋中外围，以太原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散。太原辐射全省对全省流动人口有着最强吸引力，对于外省流动人口吸引力不大。2000—2010年形成了以各地级市为中心的人口迁移格局，2010—2020年太原与其他地级市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以太原为核心，各地级市为区域中心的空间格局。这主要由于山西省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人们的居留意愿相对不强所致。省内人口迁移中省会太原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对于本省迁移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太原经济结构较为先进，服务行业门类较为齐全，吸引了本省大多求职者前往。各地级市对本市市区人口吸引力较大，是地区经济发展中

心，其辐射影响迁移人群主要是本市县区内的人口。五普、六普、七普时期迁入人口排名前三的地级市是太原、大同、晋中，阳泉迁入人口最少。由此可知山西省迁入人口迁移路线较为稳定，迁入人口群体受城市知名度与经济水平影响，迁往大城市意愿相对更为强烈^[12]。2000—2020年山西省迁入人群形成了以太原为全省迁移人口中心，各地级市为区域中心的空间格局。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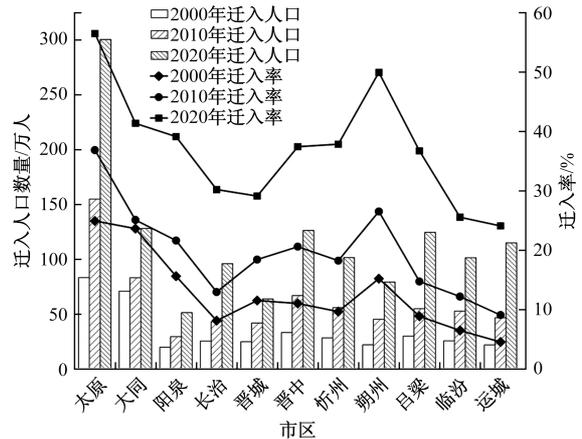


图2 2000—2020年山西省地级市迁入人口与迁入率变化

3 影响因素

3.1 经济水平

在人口迁移驱动因素当中，经济因素是最为常见且活跃的因素^[5]。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实现更高生活水准，会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迁往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15]。由山西省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太原在山西省经济当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也与太原较多的迁入人口状况相吻合。所以，迁移人口当中特别是山西本省人口为了获取更高经济报酬和节约地理距离成本，会首先选择迁往太原发展。山西省迁入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分别是太原、大同、晋中，迁入人口聚集地多位于省会城市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和县级市。太原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服务行业门类较为齐全，相较于本省其他城市具有绝对领先地位，所以出于经济因素考量，山西省迁入人口逐渐形成以太原为核心，各地级市为区域中心的空间格局。

3.2 教育资源

个人做出迁移选择不仅会考虑自己工作报酬和职业前景，还会附带考虑子女的教育机会，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会吸引具有高等学历的家庭迁入^[7,9]，教育资源优缺对高素质人才队伍具有较强的

表2 山西省2020年各地级市区生产总值及产业产值

地级市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亿元	第二产业/亿元	第三产业/亿元
太原	3 805	9	1 299	2 497
大同	1 023	20	384	619
阳泉	496	2	207	288
长治	958	20	470	468
晋城	353	1	101	251
朔州	559	13	225	321
晋中	301	15	79	206
运城	305	20	73	212
忻州	169	10	45	114
临汾	346	9	68	269
吕梁	155	2	68	85

注: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2021》。

吸引力。山西本省教育资源较为贫乏且相对集中,本省优质资源集中于省会太原核心圈围。本文以各地级市人口受教育程度占比对比各地级市教育资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在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中太原有30 861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10万人),占比为30.86%,第二名晋中为17 313人,占比17.31%。山西省高等学校共有83所,其中主体校区在太原市的共有39个(本科18所,专科21所),占比达到47%。太原教育资源在本省遥遥领先,晋中得益于紧邻太原,以榆次大学城为依托具有较多高素质人才。太原不仅在本省高等教育上具有领先地位,其义务教育阶段、特殊职业教育、幼儿学前教育都有着雄厚的教育资源基础,出于自己子女教育考量的父母,选择举家迁入到太原市,这也是太原吸引迁入人口的一大优势所在。

3.3 交通线路

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可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与人力资源配置^[10]。交通的便利性和可达度与人们的生活出行息息相关,城市的公路条数越多、里程越长、密度越大,越利于人们工作与生活出行。如表3所示,山西省城市公路密度排名前三的城市是阳泉、运城和太原。阳泉处于太原与石家庄之间,是山西连接京津冀地带的重要咽喉,所以此处交通较为便利,但阳泉城市等级较低对于周边县区辐射能力较弱,迁移人口在便利的交通条件驱使下往往会选择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大城市落户发展。另外,太原不仅拥有公路线路,还拥有铁路线路与便利的航空条件等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在本省居中的地理位置形成了铁路、航空等交通枢纽,太原作为本省唯一通勤地铁线路的城市对于本省迁移人口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表3 山西省2020年地级市公路通车里程、公路密度

地级市	公路里程/km	公路密度/[km·(10 ² km) ⁻²]
太原	7 243	103.65
长治	12 169	87.77
晋城	9 652	101.71
朔州	10 255	96.18
晋中	16 141	98.37
运城	16 096	114.11
忻州	17 448	69.29
临汾	19 326	93.87
吕梁	17 562	83.06
阳泉	5 723	125.54
大同	12 749	90.40

注:公里里程指标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2021》。

3.4 居民收入与住宅价格

房价高昂促使迁移人口在城市选择的同时需平衡好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虽然如今各大城市纷纷出台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等政策,但仍收效甚微。归根结底,高昂的消费成本与较低的工资收入失衡是其根本原因。有房可居对于迁入者来说不仅是物质居所,还是精神归宿^[11,14]。因此,住宅价格毫无疑问成为当今时下驱动人口迁移的一大重要因素,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本地区人口的外出迁移意愿越强。依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信息(图2)显示,太原房价最高且突破了1万元/m²,朔州最低为3 752/m²。房价较低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配套服务设施能力较为落后,相对于本县市区人口具有较强吸引力。在人均收入上太原具有最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达到了35 473元,是山西省唯一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的城市,也是唯一一个超过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市。忻州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为19 637元,是唯一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万元以下的城市,太原与山西其他地级市预期收入差异较大,由此驱动本省人口产生迁移。

4 建议对策

4.1 总体空间规划

以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为基准,构建“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为主体的国土开发利用格局。《规划》作为山西省城市未来发展规划蓝图,依据这一思想构想以省会太原为核心都市圈,大同、长治、临汾为省域副中心,各市域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空间规划格局。太原由于地形限制南北纵深狭长,可以有效借鉴济南合并莱芜、成都代管简阳等有效实例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太榆、太忻一体化纵深发展,加深与榆次、忻州经济社会关系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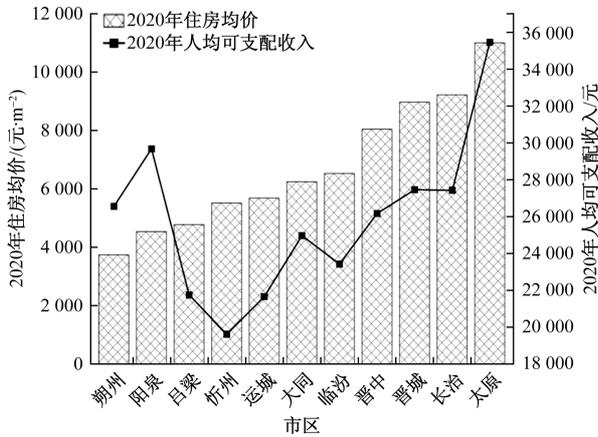


图3 2020年山西省地级市住宅均价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来,有效发挥太原中心城市群作为区域增长极和主引擎的引领带动作用。大同、长治、临汾可以利用抖音、微信等 App 平台推广城市旅游建设,将大同云冈石窟、长治太行山峡谷、临汾壶口瀑布作为城市发展旅游名片,积极建设省域副中心带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各市区发挥区域经济建设引领作用,吸引辐射本市区人口,提高城镇化水平。

4.2 产业结构转变

加快太原产业升级改造,以小店高新技术开发区为示范基地,向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高端产业靠拢,逐步淘汰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传统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带动人口向省会城市流动,加大对外省人口吸引力。加快各地级市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比,注重城市配套服务设施能力升级,加强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引导,引导人口合理流向服务行业。迁入人口由本市区逐步扩展到城市周边外围其他市区人口,加深对本市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虹吸深度。加大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汾经济开发区等开发区域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投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多种形式工业园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收入和生活标准,推动城市综合实力和人口吸附能力提升。

4.3 交通条件改善

公共交通与人口流动关系密切,发展公共交通是新时期下吸引人口迁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构建山西“一主三副多极”综合交通枢纽,太原逐渐开工建设雄忻高铁、太绥高铁等高铁网建设,力争呈现“米”字形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发挥省域示范中心带动作用。大同、长治、临汾加快城际间高铁线路铺设并与山西省现有高铁线路实现

交汇融合,推进城乡公路发展。构建“两纵四横一环”综合运输通道,促进山西本省对外交通与人口流动,合理优化山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布局,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城市内部公共交通发展要合理优化换乘引导标识,普及交通一卡通保障老年人出行,提高城市公共交通吸引力。

4.4 教育资源分配

保障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于合理优化人口布局至关重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太原与其他地级市之间办学条件和水平差距,资源配置、教育财政补贴优先向吕梁、阳泉等欠发达地区倾斜,缩小城市之间教育差距。地级市内推动城乡整体发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大力推进乡村教育发展,县城优质学校对口帮扶乡镇,提高乡村教育教学质量,鼓励名优教师下乡,促进骨干教师向农村薄弱地区流动,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实现县域师资均衡配置。利用校际合作促进校园资源共享,完善职业培训体系,缩进校际办学差距。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力,吸附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发展。

4.5 降低落户门槛

要进一步深化太原户籍制度改革,吸引本省高等学历和特殊技能人才落户发展,加大资金投入流向人才购房补助和就业补贴,简化办理流程和审核手续,拓宽人才落户渠道。加深大同、长治等地级市户籍“放管服”改革力度,放开放宽农民工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落户限制,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取得户籍,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和人才支撑。保障朔州、忻州、吕梁城市配套服务设施能力,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对于优秀创业人才予以资金支持和引导督促,非城镇常住人口落户过程要简化办理手续,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减少落户壁垒限制。持续加深各地级市辐射虹吸本市区人口,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城市等级。

5 结论

本文以全国人口普查第五、六、七次数据分析探讨山西省内迁入人口构成与现状,结果指出:①2000—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当中,仅有太原、晋中实现人口持续增长,其余各地级市在2000—2010年人口实现正增长,2010年实现人口数量峰值,之后人口数量逐年下降。②山西省迁入人口以省内跨县流入人口为主,且呈增长趋势。省内迁入人口迁移路线形成以太原为核心、各地级市为区域中心的空间格局。太原在本省有绝对优势其辐射

虹吸能力覆盖全省人口,各地级市对于本县市、本市区迁移人口有较强吸引力。③迁移人口受经济水平、教育资源、交通线路、住宅价格与人均收入等制约,人口对各影响因子综合考虑做出迁移行为。④面对人口流失,各地级市做出积极应对提升自身吸引力,可以从空间规划、产业结构、交通条件、教育资源、落户门槛五方面来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引起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是在显性基础之上选择了几个驱动因素进行考量,另外还有地理距离、社会网络、人口规模等影响因素对人口迁移产生一定影响^[5,16]。本文只是在表层基础之上通过对比分析,呼应既有文献的结论与发现,研究影响因素的作用。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后续研究仍需通过数据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以佐证自己的研究结论,加以对照并做出完善修改。通过本文的对比论证和对策建议可以为城市均衡发展、人口综合研究提供思路,在新一轮城市竞争吸引人才落户回流中获得相关启示,为城市实现区域人口均衡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 [1] 陈佳棋,王诗. 东北三省人口迁移研究[J].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2023, 16(4): 457-467.
- [2] 秦志琴. 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1): 166-171.
- [3] 张苏北,朱宇,晋秀龙,等. 安徽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3, 33(5): 24-30.
- [4] 劳昕,古恒宇,卢琳,等. 两次普查间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变化[J]. 人口与发展, 2023, 29(6): 15-30.
- [5] 张彬,蒋蕙如. 青海省人口迁移与经济耦合关系分析[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7(6): 66-72.
- [6] 蔡霞. 国内外人口迁移研究现状综述[J]. 知识经济, 2014(8): 55.
- [7] 杨倩. 中国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20(6): 125-127.
- [8] 刘静玉,李晓珍,曹志敏,等. 河南省流入人口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J].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2(6): 657-667.
- [9] 严善平. 当代中国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基本格局及变化趋势[J]. 人口与经济, 2023(5): 112-125.
- [10] 姜畅源.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中国商论, 2023(14): 146-150.
- [11] 李小帆. 人口迁移、地区教育水平与福利差距[J]. 世界经济, 2022, 45(7): 73-97.
- [12] 古恒宇,劳昕,温锋华,等. 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2, 77(12): 3041-3054.
- [13] 王明辉. 我国跨省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国情国力, 2023(1): 29-33.
- [14] CUI N N, GU H Y. Homeowner and renter payment for school quality in Beijing: boundary fixed effect analysis with housing price-rent comparison[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21, 147(3): 05021025.
- [15] HENGYU G. Understanding the migration of highly and less-educated labourers in post-reform China[J]. Applied Geography, 2021, 137: 102605.
- [16] 柯文前,朱宇,陈晨,等. 1995—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特征[J]. 地理学报, 2022, 77(2): 411-425.
- [17] 赵迪,陈鹏,李海成,等. 2005—2018年北京市外来人口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22, 24(4): 698-710.
- [18] 吴瑞君,薛琪薪,罗志华. 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格局的转折性变化: 2000—2020年[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3(1): 74-86.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0

WANG Jialong, MENG Wanzhong, LI Yiche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Shanxi,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the fifth, sixth and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0 to 2020 was observ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xi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has not changed much,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has maintained continuous positive growth only in Taiyuan City and Jinzhong City, and the population of Taiyuan Cit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of Taiyuan City is dominated by the population of other counties and districts in the province, and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have a strong attraction 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ies and districts of the cit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related to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educational resources,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housing prices and per capita incom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spatial pattern, industrial structure, education allocation,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settlement threshold,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attractiveness of foreign popul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for the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to reasonably prospect and plan the futur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w, promote the good interac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popul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Keywords: Shanxi Province; 2000—2020 years; population migration;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